

# 《大公报》政论研究： 以“国家中心论”为中心

李群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# 《大公报》政论研究： 以“国家中心论”为中心

李 群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大公报》政论研究：以“国家中心论”为中心/李群著. —北京：  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7. 1

ISBN 978-7-5161-8552-0

I. ①大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《大公报》—史料  
IV. ①G219. 29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53573 号

---

出版人 赵剑英  
责任编辑 安 芳  
特约编辑 席建海  
责任校对 郝阳洋  
责任印制 李寡寡

---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 
邮 编 100720  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  
发 行 部 010-84083685  
门 市 部 010-84029450  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---

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刷有限公司  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 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  
印 张 20.5  
字 数 318 千字  
定 价 68.00 元

---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，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
电话：010-84083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## 绪 论 / 1

- 一 选题依据与意义 / 1
- 二 研究现状与创新 / 6
- 三 主要内容与思路、方法 / 13

## 第一章 “国家中心论”的源头 / 18

- 第一节 英敛之的维新思想与办报理念 / 18
- 第二节 倡导白话文 / 21
- 第三节 提倡新诗 / 33
- 第四节 以文学为阵地阐述改良与立宪思想 / 38

## 第二章 “国家中心论”的酝酿 / 45

- 第一节 新记《大公报》的办报理念与“国家中心论”的酝酿 / 45
  - 一 “四不”办报理念及政治主张 / 46
  - 二 “国家中心论”的酝酿 / 50
- 第二节 繁荣的《文学副刊》 / 56
- 第三节 独立、自由的文学评论 / 65
- 第四节 独立与现实关怀并重的文学风格 / 83

### 第三章 西安事变与“国家中心论”的形成 / 87

#### 第一节 西安事变期间的拥蒋反张、杨言论 / 87

- 一 事变爆发后国内各界的态度和主张 / 88
- 二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救蒋生还 / 91

#### 第二节 西安事变善后阶段“国家中心论”的形成 / 98

- 一 为西安事变善后工作提供舆论支持 / 98
- 二 “国家中心论”的形成 / 104

#### 第三节 “国家中心论”下对国内各政治势力的主张 / 107

- 一 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割据 / 108
- 二 整编地方军队要求地方实力派政治中央化 / 111
- 三 对社会团体要求放弃异见统一“国论” / 115

#### 第四节 民主自由思想的潜隐 / 118

- 一 要求政府控制下的对国家负责的言论自由 / 119
- 二 倡导政府延揽人才增强统治力 / 121

### 第四章 抗战初期“国家中心论”的高潮 / 130

#### 第一节 全国上下必须拥护政府信任领袖 / 130

#### 第二节 自由民主思想的蛰伏 / 145

- 一 “国家至上、民族至上”的办报宗旨 / 146
- 二 将政治运动引入“国家中心论”旗帜下 / 149

#### 第三节 张季鸾与蒋介石：国士与领袖 / 157

- 一 西安事变期间张蒋关系的升华 / 157
- 二 张季鸾的报恩思想、国士思想 / 161
- 三 “拥蒋”与“爱国”——“国家中心论”的两点论 / 168

#### 第四节 “国家中心”旗帜下的文学副刊 / 172

- 一 《文艺》与京派作家再聚首、《战线》创刊 / 173
- 二 众声汇聚的文学空间 / 178

## 第五章 抗战中后期“国家中心论”的淡化 / 191

### 第一节 提出修明政治，以谏言督责方式拥护国民党政府 / 191

- 一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修明政治案的提出 / 191
- 二 主张修明政治 / 195
- 三 对政府“小批评，大帮忙”的办报思想 / 198

### 第二节 要求共产党服从“国家至上”原则 / 201

### 第三节 积极参与第二次宪政运动 / 207

- 一 赞扬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 / 208
- 二 鼓励宪政实施协进会 / 213
- 三 积极参加有关宪政问题的讨论 / 216

### 第四节 《大公报》与蒋介石关系的疏离 / 221

## 第六章 “国家中心论”的终结 / 225

### 第一节 为实现和平统一而呼吁、呐喊 / 225

- 一 对国共内战的担忧 / 226
- 二 对重庆谈判寄予厚望 / 228
- 三 欢迎马歇尔调停 / 232
- 四 期待政治协商会议 / 236
- 五 南京谈判最后希望的破灭 / 243

### 第二节 脱离现实的中间立场 / 246

- 一 警告国民党在复员中莫失尽人心 / 246
- 二 妄想共产党勿以兵争，走政争之路 / 251
- 三 脱离现实的中间立场 / 254

### 第三节 自由民主思想的回归 / 257

- 一 言论自由的期待与失望 / 257
- 二 “人民至上、主权在民”思想 / 262

### 第四节 王芸生从激进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的转变 / 265

余 论 / 273

一 《大公报》政治理想与现实结局 / 273

二 《大公报》文学理想与现实结局 / 289

参考文献 / 303

# 绪 论

## 一 选题依据与意义

创始于1902年6月17日的《大公报》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报龄最长的报纸。历经英敛之、王致隆、吴鼎昌、胡政之、张季鸾等合组的新记公司和新中国成立后重组的《大公报》董事会等4个时期，先后出版过天津、上海、汉口、重庆、香港、桂林、北京等7个版，总发行量一度达到20万份，至今它的香港版还在继续发行，是近代中国影响最大、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。《大公报》的所载所感实际上就是对百年中国史的记录与解读。

1902年6月17日，《大公报》在天津正式创刊。自创刊之日起，《大公报》便致力于开启民智、申达民隐、抨击权贵、讥评时政，很快就成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媒体，日发行量一度达到五千份。在近代中国历史上，由于时局动荡，这份报纸几经兴衰。这一报纸媒体作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的重要舆论力量，以新闻与评论的方式详细地记载了全国各地特别是华北、天津本埠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或琐碎的大事小情，记录下了大量的历史信息。它曾提出兴立宪、戒缠足、发展新式教育、推广白话文等一系列社会改良主张。1926年新记《大公报》创刊，它迎来了历史上最为鼎盛的发展阶段。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《大公报》为国为民辗转播迁。2002年6月17日，《大公报》度过了其百年华诞。这份经历百年沧桑的报纸成为存在时间最长、发行范围较广、影响甚大的中文报纸，可谓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。正像著名学者季羨林在纪念



《大公报》创刊 98 周年座谈会上所说的那样：“《大公报》的一百年可以涵盖中国的 20 世纪，从第一期到现在，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。”<sup>①</sup> 作为一张引导了几乎一个时代舆论的全国性大报，《大公报》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世所公认的。

我国台湾学者赖光临将《大公报》定位为“独立报纸”，即“指有别于政治性与商业性报纸而言，而兼有两类报纸的特色，即以商业经营为手段，不以盈利为目标，仍保持文人论政的本色与宗旨”<sup>②</sup>。吴廷俊先生认为：“商人办的多为商业性报纸，党人办的多为政治性报纸……《大公报》既不是党人办的报纸，又不是商人办的报纸，它是一张文人办的报纸。”<sup>③</sup> 其实“独立报纸”“文人报纸”都指出了《大公报》的办报特色。

考察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。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，维新运动与民主革命时期两个办报高潮涌现的报纸中，如《时务报》《民立报》等属于政党报纸的范畴，而《大公报》《申报》等则当属于大众商业报纸的范畴。无论是独立性还是商业性，无论是文人办报还是商人办报，都是作为大众商业报纸的特色而已。

早在 19 世纪末，日本报坛上就曾活跃过自我标榜的独立报纸，而这些报纸都以言论见长。1889 年创刊的《日本》在其发刊词中就全面否定了“偏于党议”的机关报，以及“只图私利”的商业性报纸，宣称自己是奉行“国民主义”的独立报纸。<sup>④</sup> 然而这些报纸最终并没有形成体系。作为留日学生且对从事新闻事业抱有浓厚兴趣的胡政之、张季鸾等人从理想出发，希望《大公报》能卓尔不群，办出特色。胡政之曾对《大公报》同人这样说过：“我国过去的报纸大致可以分为两派：一派专为表达所属政党的政治主张；一派则完全着眼于生意。前者在民国初年为其鼎盛时期，各党各派无不拥有机关报；后者则发源于上海，绝口不谈政治，要以赚钱为目的。我对以上两派都觉得无聊，都不以为然。我认为一份理想的报纸，

① 方汉奇主编：《〈大公报〉百年史》“序言”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。

② 赖光临：《七十年中国报业史》，（台北）“中央”日报社 1981 年版，第 111 页。

③ 吴廷俊：《新记〈大公报〉史稿》，武汉出版社 1994 年版，第 5 页。

④ [日] 稻叶三千男、新井直之：《日本的报业理论与实践》，新华出版社 1985 年版，第 30 页。

要兼顾营业与事业。营业能独立，始能站在超然的地位，不为他人所左右。”<sup>①</sup>《申报》的史量才也认为“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”，<sup>②</sup>要讲求经济独立，言论中立。而实际上，任何报纸即使经营独立了，其言论也不可能完全超越于现实和其阶级立场，这里独立办报其实也是相对的。新记《大公报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形成特色。

营利、论政不为参政，以文章报国，为民众鼓呼，《大公报》可谓发挥到了极致。张季鸾曾这样阐述：“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，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，不是实业机关。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的落后，但也可以说是特长。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，但程度还很浅。以本报为例，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，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，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。”<sup>③</sup>可以说，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缓慢，与之相适应，报纸的商业化程度还不是很高。但受西方报业经营理念的影响，中国报纸的商业化运作已有一定发展。最具有代表性的如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，就因其在经营上的成功而成为当时的全国性大报，截至1930年，两报的发行量均已达到15万份左右。<sup>④</sup>

从出身来看，诸多报人当初的身份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转变而来的文人。作为主事，《申报》的史量才担当过《时报》的主笔；《申报》的陈景韩以擅长写精锐的时评而著称；《新闻报》的李博虞和张季鸾同出刘古愚门下，道德文章都很优秀，也是文人，又都是职业报人，以文章报国为己任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的《申报》，一改小心谨慎的政治态度，时评及改版后的“自由谈”就颇为社会注目。只不过《申》《新》二报更多地偏重于以商业原则经营报纸，而《大公报》则由于其言论为社会所重，使得其在经营上的成功往往被忽略，文人办报的特色尤为凸显。其实从经营上讲，《大公报》也是有其独到的成功之处的，它的一套经营管理模式在当

① 转引自周雨《大公报史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371页。

② 史量才：《欢迎格拉士莅馆时的致辞》，《申报》1921年12月23日。

③ 张季鸾：《本社同人的声明》，《大公报》（重庆版）1941年5月5日。

④ 参见方汉奇《中国新闻事业史》（第二卷）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78页。

时可以说是比较先进的，也是较具有代表性的。尤其是在《大公报》内部实行的行政业务，必须先受编辑训练的用人制度，使得编辑部与经理部之间能做到相互理解、相互配合、相辅相成，促进了报社业务的发展，以致其日发行总量逐渐达到20万份的空前数字，超过了《申报》和《新闻报》。它的成功就是真正做到了关注政治，重在经营。所以长于经营的《申》《新》二报也关注政治，以文人论政著称的《大公报》经营也十分出色。它们共同体现了大众商业报纸的特色。它始终以文人办报的特色、见地独到的言论以及对于社会舆论的引导而著称，正因如此，《大公报》是一份以“文人论政”为主要特色的大众商业报纸。

从近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来看。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“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，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，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，是不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”<sup>①</sup>。胡绳同志晚年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1995年，在《胡绳论“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”》中提出“现在讲这段历史的书，主要讲国民党和共产党，讲他们的矛盾斗争；论阶级，这是两极，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，一个是无产阶级。其实，这两极中间，还有一大片。所以我想，除了国、共两个角色外，还应有第三个角色，这就是中间势力。——革命能胜利，是因为我们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，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”，“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”。“中间势力是什么人？包括知识分子，工商界，搞工业的，搞教育的，等等。过去说，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，工农、小资产阶级属于共产党一边的，是革命的依靠、基础。实际上工农、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。就阶级说，他们是革命的，就具体的人说，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，不可能一开始就自动跟共产党走。”胡绳还说：“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，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，不是倒向这一边，就是倒向那一边，最后总的说是站到共产党一边。中间力量有不

---

<sup>①</sup>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：《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》（1941年5月8日）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2卷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783页。

少代表性人物，它们影响一大片。国民党失掉了中间力量，不可能不失败。”<sup>①</sup> 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，必须研究中国“中间势力”发展的历史。

正是由于其出色的经营和文人论政的传统文化底蕴，使得《大公报》在抗战期间虽然历经磨难，却也成就了它的辉煌。1941年5月15日，《大公报》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为最佳外国报纸并被授予荣誉奖章，为中国新闻界首次赢得此项殊荣。获奖证书中评价道：“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，《大公报》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，始终充实而精粹，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至巨。”<sup>②</sup> 《大公报》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全国的舆论重镇。对《大公报》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，也做过大量的争取和“团结”工作。张季鸾逝世的消息发布后，毛泽东、周恩来和中共的不少高级领导人都发了唁电，给予很高评价。重庆当时有十几家报纸，享有上述待遇的，只有《大公报》一家。同时，《大公报》也是国民党蒋介石十分看重的报纸，主编张季鸾与蒋介石交情深厚，蒋介石身边常备《大公报》随时翻阅，重视程度甚至超过《中央日报》。

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的《大公报》，中间势力所特有的“两面性”和“动摇”“不断分化”等特点，在《大公报》的身上都有表现。它政治倾向及立场的转变，正是“中间势力”由一头走向另一头的反映。张宪文先生指出，“《大公报》的‘社评’或其他政论文章、新闻报道，为探讨中国的政治发展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史料”<sup>③</sup>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《大公报》又是中间势力中舆论界的一员。作为中间势力的一员，《大公报》的政治立场、主张与中间势力中其他成员既有一致的地方，又有区别。这种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间势力所具有的“不断分化”的特点。

《大公报》在1902—1949年这47年中“国家中心论”始终是指导其言论的一条主线。其发展经历了一个酝酿、形成、提倡、淡化到终结的过

<sup>①</sup> 参见“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”课题组《胡绳论“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”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3、4、6页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周雨《大公报史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43页。

<sup>③</sup> 张宪文：《中国现代史史料学》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78页。

程。其间，“国家中心论”以蒋介石为对象，所以，这一发展变化的过程就是其政治立场由拥蒋到中间的转变。可以说其转变的总趋势具有中间势力的共同特点，但是转变的方式和结果，又有自身的特点，它没有转向共产党，而是转到中间立场，最终结局是“属于人民”。

通过考察在“国家中心论”指导下《大公报》政治主张的变化和自由民主思想的演变，可以透视中间势力政治立场及思想发展演进的一个侧面。诚如胡绳先生所说，中间势力是一个充满动摇性、复杂性的“不断分化”的群体，因此要对其有整体的认识，进行分别的个案研究十分必要，并且具有重要意义。目前近代史学界及新闻史学界关于《大公报》的研究虽然已有一些成果问世，但与该报的地位仍不相称，尚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，本书拟对1902—1949年的《大公报》“国家中心论”进行研究，以弥补其不足。

## 二 研究现状与创新

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，对《大公报》的研究几乎空白，即使有一些会议和评论文章，也不是实事求是和客观公正的。王芸生、曹谷冰所著回忆录《1926至1949年的旧〈大公报〉》，因为由大公报人撰写，并且所述内容与事件发生时间相差不远且多为亲历，而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，成为后人编写《大公报》史的基础，却被抹上了浓重的时代印记，文中随处可见大公报人的自我讨伐之辞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对《大公报》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。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，虽然还不够全面系统，与其所拥有的大报地位还不相称，但毕竟已开始较为客观地对《大公报》的历史进行回顾和评价。

最先著文立说的是一批老大公报人。李纯青的《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》，对《大公报》是否为政学系机关报、《大公报》的资本性质、如何看待“国家中心论”等历史问题，都做了较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。周雨的《大公报史》则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关于《大公报》的著述，在一些问题上已纠正了原来“左”的倾向，诸如“旧《大公报》是官僚资本企业，主持

者吴鼎昌、胡政之、张季鸾三个人都是大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”<sup>①</sup> 这样不完全符合实际的绝对化论述在文中已不再出现。而是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力求恢复旧中国时期《大公报》的本来面目，写出一部全面反映《大公报》历史、特点和发展规律的专书，使之成为一部信史”<sup>②</sup>。此外，由老大公报人撰写的人物传记、回忆录、大事记等也相继出版。如徐铸成的《报人张季鸾先生传》《徐铸成回忆录》《报人六十年》《报海旧闻》及《旧闻杂忆》系列，孔昭恺的《旧大公报坐科记》，李纯青的《笔耕五十年》，王文彬的《新闻工作六十年》，周雨的《王芸生》及其主编的《大公报人忆旧》，方蒙的《范长江传》及其主编的《〈大公报〉与现代中国》，等等。另有一些未能独立成著的相关文章散见于《文史资料选辑》《新闻研究资料》《新闻界人物》《近代中国名记者》及相关报刊。这些著述与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尽可能还《大公报》以本来面目，为后人研究《大公报》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。

后来，大公报后人加入了《大公报》研究的队伍，王芝琛的《百年沧桑——一代报人王芸生》，披露了《大公报》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，包括范长江离开报馆、香港馆起义，等等。王芝琛与刘自立合编的《1949年前的〈大公报〉》则对《大公报》的一些老照片、社评、星期论文等资料进行了整理。

我国台湾的老大公报人陈纪滢所著《报人张季鸾》《胡政之与〈大公报〉》《抗战时期的〈大公报〉》可以被认为是海外研究《大公报》的主要成果。由于陈纪滢的当事人身份，使得文中的回忆更具可信性，常被后来的研究者所征引。

学术界对于《大公报》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。夏晓林的《张季鸾》一文率先肯定了张季鸾作为“著名的记者和报刊评论家”的地位，指出“他是继王韬、梁启超之后最有影响的中国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之一。他

<sup>①</sup> 王芸生、曹谷冰：《1926至1949年的旧〈大公报〉》，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25辑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3页。

<sup>②</sup> 周雨：《大公报史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447页。

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报纸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”<sup>①</sup>。比较权威的评价来自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著名学者方汉奇先生。他在《中国新闻事业通史》中指出：“历史事实证明，《大公报》是一张爱国的报纸。《大公报》主持人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。《大公报》的崛起，是中国资产阶级报业试图成为‘第四权力’的较有成就的尝试。”<sup>②</sup>这一论述对于《大公报》史乃至中国现代新闻史，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另一位新闻史学界的学者吴廷俊先生在他的《新记〈大公报〉史稿》中涉及对“小骂大帮忙”一说的评价问题，在其看来“‘小骂大帮忙’是合法的民办报纸为本阶级长远利益服务的一种较为有效的办法”<sup>③</sup>。这是一个客观中肯的评价。天津大学贾晓慧博士的专著《〈大公报〉新论》，以20世纪30年代《大公报》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为主线展开论述，<sup>④</sup>为研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媒的运用和作用，提供了有益借鉴。南京大学任桐博士的毕业论文《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——〈大公报〉政治改良言论述评（1927—1937）》是又一部有关《大公报》史研究的专著。他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，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，以《大公报》的言论导向和发展史貌为切入点，探讨1927—1937年间中国政治改良思潮的脉动，社会时局的走势以及民间舆论的演变。以《大公报》“十年发展期间对政治改良思想的传播为主线展开论述，以彰显大公报人基于民本思想、期于民主政治、弘扬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”<sup>⑤</sup>。方汉奇先生领衔主编的《〈大公报〉百年史》，在研究过程中明确引入了中间势力观点，方先生指出：“在政治倾向上，《大公报》属于‘中间势力的报纸’。”<sup>⑥</sup>该书系统地介绍和评析了从1902年6月17日到2002年6月17日这家报纸津、沪、汉、港、渝、桂等六个

① 夏晓林：《张季鸾》，《新闻界人物》，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43页。

② 方汉奇主编：《中国新闻事业通史》（第2卷）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468、477页。

③ 吴廷俊：《新记〈大公报〉史稿》，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30—31页。

④ 参见贾晓慧《〈大公报〉新论》“摘要”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页。

⑤ 任桐：《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——〈大公报〉政治改良言论述评（1927—1937）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，第265页。

⑥ 方汉奇：《〈大公报〉百年史》“序言”，《〈大公报〉百年史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页。

版整整一百年的历史，是对这家报纸历史的一个全面描绘，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《大公报》通史著作。

综观所有研究成果，《大公报》在近代中国的政治、文学、社会、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地位。其中，《大公报》的“国家中心论”和自由民主思想是其最受关注的政治主张。作为在传统教育下成长，又接受了西方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，“国家中心论”反映了大公报人对于权威的推崇。而对自由民主，尤其是言论自由和宪政民主的追求，则是大公报人崇尚的基本理念。二者贯穿于其发展的始终。看似矛盾的两点主张，却在《大公报》身上融合为一。百年《大公报》是一部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，其所见、所闻、所感，浩如烟海。本书试图沿着其“国家中心论”发展的轨迹并结合其各个时期自由民主的追求，来探寻其生存、发展、辉煌的内在动因。

关于“国家中心论”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在三个问题上，即形成的时间、演进的过程、对其的评价。

首先，形成的时间。王芸生和曹谷冰合著的长文《1926至1949年的旧〈大公报〉》认为，“张季鸾拥护蒋介石，一直发展到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《大公报》社评《读周恩来先生的信》一文中的‘国家中心’论，把蒋介石当作‘国家中心’来拥护”<sup>①</sup>。《读周恩来先生的信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我们在今天，只希望认识一点，就是：敌我的形势，自己的国力，世界的时机，都绝不容许存一种观念，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，还可以再建一个，然后将国家再组织起来。这样的事是必无的。若使现在的中心失败了，那就是亡国之局。所以一般军民同胞的基本认识，是必须拥护国家中心的国民政府，以贯彻自主自卫之目的。这是惟一的路，此外无路。”周雨认为关于“国家中心论”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就是《读周恩来先生的信》，<sup>②</sup>实际上沿用了王芸生和曹谷冰的说法。吴廷俊认为“国家中心论”形成于西安事变后。1937年6月23日，在社评《对于国事之共同认识》中，《大公报》期望全国各界人士一致遵守两点认识，其中第一点便

<sup>①</sup> 王芸生、曹谷冰：《1926至1949年的旧〈大公报〉》，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25辑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30页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周雨《大公报史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107页。



是：“愿一致认识拥护国家中心组织为建国御侮之前提条件。故一切思想行动，凡增加向心力者为是，凡促进离心力者为非。”这篇社评的发表标志着“国家中心论”正式形成。<sup>①</sup> 吴的观点目前为大多数研究者承认。

其次，演进的过程。任桐和吴廷俊曾对“国家中心论”的发展脉络进行过介绍，但都是限于其整个研究的一小部分，没有进行专门、细致的梳理。

吴廷俊在《新记〈大公报〉史稿》中认为，“国家中心论”提出于新军阀混战之时，酝酿于抗日救亡之际，正式形成于西安事变之后。后来在抗战八年中，这个“国家中心”又有所发展；在解放战争中，这个“国家中心”仍然顽固地起作用，直到蒋介石这个“国家中心”在中国大陆被摧垮。<sup>②</sup> 这里谈到了“国家中心论”起止的时间，即开始于新军阀混战之际，结束于国民党败亡之时。

任桐曾经对“国家中心论”从酝酿、发轫到形成的过程作过论述，认为“国家中心论”从发轫到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以《民国二十年元旦献辞》的发表为标志，这一阶段是《大公报》唱扬“国家中心论”的初始阶段，其“国家中心论”以南京国民政府为拥护对象，而没有明确指向任何领袖个人。第二阶段始于星期论文专栏的民治与独裁的论争，这一时期可以被认为是《大公报》唱扬“国家中心”的过渡阶段，其“国家中心论”的拥护对象虽然形式上还是作为团体的南京国民政府，但实际上已显露出对作为领袖的蒋介石的明显偏向。第三阶段，西安事变发生后的一系列社评的发表，是“国家中心论”的形成阶段。这一阶段，其拥护对象已从南京政府转变为蒋介石。<sup>③</sup>

吴廷俊对“国家中心论”演进过程的概括提到了其起始和结束的时间，但对其发展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没有明确界定。任桐对“国家中心论”的脉络论述得较为清楚，但是由于他研究的时间段是1927—1937年，

① 参见吴廷俊《新记〈大公报〉史稿》，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263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263—265页。

③ 参见任桐《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〈大公报〉政治改良言论述评（1927—1937年）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，第207—213页。